



王列耀 主编

语言寻根 文化铸魂

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论文集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语言寻根 文化铸魂

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论文集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编

主 编：王列耀

特邀主编：杨匡汉

副 主 编：吴奕锜 龙扬志（执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语言寻根 文化铸魂：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论文集 / 王列耀主编；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360-8105-5

I. ①语… II. ①王… ②中…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2980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林露茜

书 名	语言寻根 文化铸魂：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论文集 YUYAN XUNGEN WENHUA ZHUHUN; SHOUJIE SHIJIE HUAWEN WENXUE DAHUI LUNWEN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0. 75 1 插页
字 数	540,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编

-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 饶芃子 / 3
- 关于华人和华人文化诗学 / 刘登翰 / 11
- 中国大陆世华文学研究之昨天、今天与明天 / 曹惠民 / 22
- 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政治意义 / 刘小新 / 38
- 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谱系 / 袁勇麟 / 50
- 近 20 年“海上丝绸之路”诸国华文文学发展的融汇倾向 / 萧 成 / 68

第二编

- 解读台湾的图像 / 林静助 / 81
- 高雄对余光中的意义 / 张忠进 / 112
- 哲性的乡愁 / 龚 刚 / 128
- 福佬和客家：文化性格的差异与互补 / 朱双一 / 137
- 台湾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多种路径 / 朱立立 / 150
- 被“污名”的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学 / 陆卓宁 / 162
- 新世纪台湾诗歌创作的走向 / 古远清 / 173
- 立望关河到鹤群归来：李渝小说跨艺术互文的怀旧现象 / 苏伟贞 黄资婷
/ 181
- “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台湾散文史述 / 蔡江珍 / 202
- 台湾客家女性形象塑造的族群文化记忆 / 樊洛平 / 213
- 21 世纪初台湾文化论争形成的共生因素考察 / 钟希明 / 221
- 叶荣钟与 20 世纪 30 年代台湾的言论空间 / 张重岗 / 235

背离与回归：“先锋”探索的一体两面 / 白 杨 / 246
台湾当代文学中的香港书写 / 杨 明 / 256
两岸青年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状况调查 / 张 羽 金 林 / 264
香港与世界华文文学 / 潘耀明 / 274
《我城》的香港想象 / 金惠俊 / 280
对倒叙事：香港后现代电影和小说的融合剂 / 凌 逾 / 297
文学场与澳门文学批评话语之建立 / 龙扬志 / 315

第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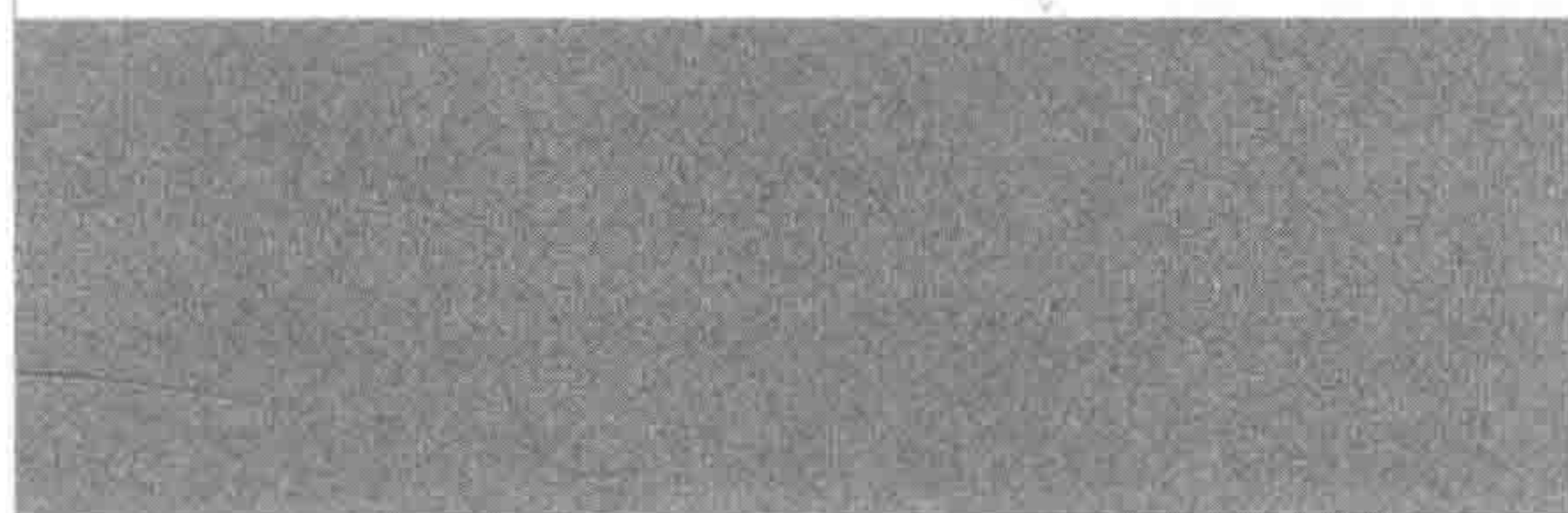
华语语系文学建构与融合困境 / 张 凤 / 327
古典诗歌的创作与在地化：加拿大早期华人文学初探 / 梁丽芳 / 334
叶维廉与现代主义 / 闫月珍 / 345
旅美作家刘再复散文创作中的“故乡认同” / 古大勇 / 359
论《金山》的“传奇”及其定位 / 颜 敏 / 373
零落成泥碾作尘 / 李 良 / 381

第四编

内在的风景 / 黄锦树 / 393
现代主义的理论旅行：论余光中对马华文学影响 / 李树枝 / 407
再现中国性的幽灵 / 胡贤林 / 417
论日本新华侨华人的诗歌创作与海洋意象 / 和富弥生 / 428
逍遥此身不为客 / 陈庆妃 / 445
简谈“澳华留学生文学”的嬗变 / 何与怀 / 463
论新西兰华文文学的“长者现象” / 周文萍 / 476

编后记 / 487

第一编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饶芃子

文学经典是文学发展变化过程的集中表现。任何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其特质主要是表现在经典著作上。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清理出其中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辅以国别间文学的影响研究，从历史的、文本承传的角度去解读，展示这一领域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诠释其“新”和“不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特殊文学“世界”的发展和律动，了解其特质，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发展互动。

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的意义

文学是“人学”，是不同时代、社会人们的认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象反映。文学创作指向的是人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正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表现。对此，学界已有共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领域，其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别于中国古代和现代，也不同于西方和东方其他国家的主流文学传统。如何从世纪的长度，审视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梳理其脉络，对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进行研究和阐释，在文化上直接关系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外传，特别是中外文化频繁相遇和交会的现象，在文学上就与这一领域的文学经典研究有密切的联系。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一是它已突破了“国族”的文学疆界，当中蕴含有许多民族性和世界性多元文化混溶、对接的文学问题；二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它具有开放性、跨越性的文化/文学特质。也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是一种新的汉语文学经典。这就要求研究者要以新的眼光和世界性的视野，用心去解读海外华文作家笔下那一幅幅多重文化话语的精神形象图，通过对系列作品的深入剖析，特别是对许许多多优秀作品研究成果的积累，在文学领域里

形成一个自身的“张力场”。

何谓经典？20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曾给文学经典下了12个定义^①。可见文学经典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很难从一个方面就将其论说清楚。但文学经典是文学史的重要路标，应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共性，中外学者针对不同的经典，有各种各样的界定和阐释。从广义的角度，笔者认同陈众议新近提出的两个方面的概括：一、它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那种高度的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等）；二、其文学创作方法的魅力及审美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和消融^②。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笔者认为，经典文本应具有下列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从时间的意义看，它是历代读者的共同选择，经历过不同历史时期读者的检验；第二，从展示的生活深度看，其内容能直接付诸读者的灵魂，能与不同时期的读者“对话”，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有超越社会、时代的意义；第三，从艺术的角度看，在自己的艺术传统中有“陌生”的一面，也就是有自己的创新。文学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任何文学经典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甚至是对前者“颠覆”的基础上。传承、翻新，是指对原先经典优秀传统的发扬和拓展；而“颠覆”，则是指借助以往经典的艺术生命力，在它的启迪下，反其道而行之，创造出有另一种新意的经典，而原来的经典并没有因此被“取代”和“淘汰”，反而因此获得了新的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文学，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都是一时一地华人文心的艺术呈现。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华文作家个人的不断表达、传递、塑造，艺术地展现本民族人们在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已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并且以其独特的文化、文学形态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是海外华人作家在域外与各民族文化对话之后创作出来的，当中已发生了文化上的“染色体”作用，蕴含有各种“世界性”的因素。因此，这一领域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文化生态往往是多元重叠、丰富多彩，是无数“这一个”的“和”。对这一领域经典文本的确立和阐释，既关系到对这一新兴文学领域的认识、评价，也直接关系到对其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特色、价值的展现。

^① [意]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② 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大系》总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二、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和特殊性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于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会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限，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二、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三、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做研究，既要

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以“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做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①。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②。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式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

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① 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② 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第 43—45 页。

三、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会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 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 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 20 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①，也将为 20 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板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

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

^① 黄万华：《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学术史视野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2012 年 10 月，第 438 页。

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① 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问题：（1）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2）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3）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4）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

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②。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结合起来，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

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

① [意]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第1页。

② 饶宗颐：《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24页。

(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

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官的、又是理智的快感^①。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

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一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会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

^① [美]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惠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 页。

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① 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明“史实”；二是要对体现其历史变化发展的文学经典进行阐释，立“标帜”。前者，学界已有若干或详或略的文学史问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关注的问题。但从探讨此领域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这两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陈思和说过：“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②。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的“天空”，都离不开那些“星星闪烁”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史”的基础、“论”的依据，各种优秀文学传统的生命之“光”，没有它们的“灿烂”，我们就很难观赏到壮丽的文学“夜空”。所以我们在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意义及形成的新传统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一领域那些类似“明星”的文学名著，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观赏到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中文系

[基金项目]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批准号：11&ZD111)

① [美]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惠辉等译，第2页。

②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名篇十五讲》，第2—3页。

关于华人和华人文化诗学

刘登翰

一、关于“华人”：一个概念的重新辨识

华文文学是一个语种文学的概念。语言作为一种公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使用，因而华文文学的涵括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不过，华文作为华人的母语，华人应是华文文学的主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对于“华人”这一概念，其所指为何？从语词的缘起、词义的演变，以及当下约定俗成的专指，则有必要做一番辨析和说明。

“华人”一词的出现，据《汉语大词典》“华人”条所引南朝宋谢灵运《辩宗论·问答附》云：“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可见，“华人”一词在1500多年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已使用。不过，这里所说的华、夷，指的是汉族和汉族周边的其他民族。因为，汉族构成的核心是古代居住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简称为“华”，“华人”便也是汉人的称谓。此后历朝，基本上延续这一用法。唐许浑《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诗有云：“恩沾残类从归去，莫使华人杂犬戎。”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滇南异产》亦称：“夷人珍之，不令华人得售。”都是例证。

直到晚清，华、夷对举才变为华、洋对举，指称亦有所变化。吴趼人《恨海》第七回有言：“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这里不称夷而称洋，一方面是在漫长历史的民族融合中，原来的夷、戎等早期部族或融入汉族，或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里的“华”，已不单指汉族，而有了中华民族的涵义。另一方面则因为西方异族的进入中国，矛盾尖锐。习惯用法上的华、夷对举，已由汉族与境内兄弟民族的对应，转为与境外异族的对应。在这里“华人”实际上指的是“国人”。

辛亥革命以后，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建立。资料显示，此后“华人”的称谓，已更多为“中国人”的称谓取代。1883年，郑观应在呈交李鸿章的《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合同》一文

中，首用“华侨”一词，系由“华人”脱颀而来，用以专指海外的中国侨民。由此，华侨和华人便成为这一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特殊移民群体的指称了^①。

从理论上讲，华人或华族，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然而民族这个概念可以有多重的规定性。人类学从种族、血缘和文化来界定民族。华人或华族在古代指汉族，但在今天这个概念的外延则泛指包括诸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管你是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还是居住在中国本土以外并加入了所在地国籍的非中国人，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子裔，你就是华人。国家认同可以改变，但种族、血缘不可更易。在这个意义上，华人或华族是跨越国家界限的。然而，政治学却从国家形态的政治属性来规范民族。这时候，民族和国族、国家是重叠的，其成员是国民。也就是说，尽管你在种族和血缘的关系上是华人或华族，但只要你在政治上认同和归属了这个国家，你便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你的华人或华族身份便是这个国家多元民族构成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华人或华族的种族身份，又是从属在国家政治身份之下的。这是一条“游戏规则”，无论你从事的是政经实务还是学术研究，都不容混淆。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外移民史。随着时代的发展，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其身份也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华侨华人学的研究将这个变化概括为从华侨到华人的两个阶段。所谓“华侨”，是指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侨民。历史上中国都把侨居海外的中国人，视为自己的子民。无论1909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的《修正国籍法》，还是1929年国民政府的《国籍法》，都持同一政策，即使他们“数世不归”，仍为他们保留中国国籍；而海外的侨民，也把中国视为他们应当首先效忠的祖国。这就是华侨。

这一状况到了二战以后发生变化。首先是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中国移民最多的东南亚，纷纷摆脱殖民宗主国的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其所推行的本土化的民族政策，促使华侨必须从政治上做出是效忠于移居地的国家还是效忠于移出地的祖国的选择。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会议宣布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尊重华侨关于国籍的政治选择。于是绝大多数长居海外的华侨改变了自己的国籍身份，不再是华侨，而成为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华人，如新加坡华人、泰国华人、菲律宾华人等。这一词语

^① 参阅新加坡华人学者张从兴的《华人是谁？谁是华人？》，该文对“华人”一词的产生、词义演变作了详细、深入的考辨和论析。